

诗情与共

——记沈秉成严永华

◎两浙人物 □蔡圣昌

沈秉成，湖州菱湖竹墩人，原名秉辉，字仲复，号听蕉（1822～1895），其父沈功枚，历任福建同安、陕西岐山知县，秉成为其次子。沈秉成自幼喜爱读书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中举人，咸丰六年（1856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又出苏松太兵备道，巡抚广西，复迁安徽，官至两江总督，人称沈中丞。沈秉成共娶过三位妻子，在遇到严永华之前，他曾经两度丧妻并丧子，家庭的不幸使他身心疲惫，后遇到嘉兴桐乡严永华，再结良缘，才让他重新焕发青春。

严永华，字少蓝，浙江桐乡人，其父严廷珏，字比玉，贡生，云南顺宁知府。严永华为其次女。严永华的哥哥严展，字缙生，咸丰九年进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任刑部主事。

严永华出身书香家庭，她母亲王氏即会作诗，严永华自小受母亲影响，很小便会认字作诗。沈秉成在京城做官时跟严永华的兄长严展相遇，并成为非常好的朋友，他跟严永华相识即由严展介绍。

笔者曾经在上海图书馆阅读《蝶砚庐诗钞共二卷》《纫兰室诗钞共三卷》《蝶砚庐联吟集》，这几部诗稿是严永华过世后，沈秉成为其整理刊刻，并请了几个名士作序，由四子沈瑞琳、五子沈瑞麟负责校正。诗中收录严永华所作的诗篇，以及沈秉成和她合唱的诗作。

如严永华在11岁所作的诗《送缙生兄应试北上》：

破浪乘风壮此游，雁行分手意悠悠。

相期早啖红绫饼，聊慰门间朝暮愁。

沈秉成1867年娶严永华，时严永华已31岁，到1890年严永华过世，他们夫妇共同生活20余年，这段时间是沈秉成最快乐的时候，他们伉俪情深，且生活充满情趣：

《戊辰正月三日自硤石至竹溪留月余寄怀》是沈秉成娶得夫人以后回到湖州菱湖竹墩所作的诗篇，诗中写诗人新婚离别对妻子的无限深情：

屠苏才一醉，又放竹溪舟。

未信情能遣，无端此小留。

春波通锦鲤，湖堍回金牛。

相忆还相慰，应销近别愁。

颇怪鱼书杳，连宵枕未安。

忽披数字字，不厌百回看。

绣陌沾新雨，珠帷怯嫩寒。

寄声珍重意，带眼莫愁宽。

竹溪即今天的菱湖竹墩，是沈秉成的故乡，也是沈氏家族的发源地。戊辰正月，即1868年正月，应该是沈秉成新婚不久。桐乡的硤石跟湖州竹溪，本是一水相连，两地相距不远。但是在当时，因为没有汽车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，因此想要见面也不



菱湖竹墩村先贤家风馆

是太容易。

1874年，沈秉成在苏松太道职上因病寓苏州，携夫人严永华移居拙政园，他跟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之万约定到苏州隐居，后在苏州购置涉园废址，在旧园基础上设计建设耦园。1876年，耦园竣工，他携夫人同住，一住就是八年。那段时间，也是沈秉成赋闲在家的的时候，他跟夫人在耦园内诗酒唱和，诗情与共，几乎成为逍遥世外的神仙眷侣，耦园内的一花一木，一石一草，都留下他们夫妻恩爱的痕迹。苏州自古繁华，许多达官贵人退休后都选择到苏州隐居。当时经常聚会的有曾经的江苏巡抚、拙政园主人张之万；有苏州人，进士、曾经任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；有湖州人、曾经的苏州知府吴云；有湖州人，举人、藏书家、曾经任福建盐运使的陆心源；有苏州人，曾经的江苏布政使李鸿裔等。

《竹溪沈氏家乘》（沈秉成1884年修本）内有关于沈秉成的生世记载。沈秉成共娶过三位夫人，原配王氏，其父为道光举人，福建政和知县，于1842年过世。继娶姚氏，其父为保定府通判，于1866年去世。继娶严氏，为桐乡严永华。共生五个儿子：长子凤保，二子凤佳，为姚夫人所生；三子延馨、四子瑞琳、五子瑞麟为严夫人所生。长子凤保，年十八去世。二子凤佳，过继给沈秉成五弟。三子延馨过继给族弟秉焄为子。四子沈瑞琳，1872年生，字松生，号砚传，别号坦安。五子沈瑞麟，1877年生，字柏龄，号砚裔，国学生，议叙以郎中选用。

又据《吴兴沈氏文化研究》记载，沈瑞琳为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举人。沈瑞琳和夫人龚韵珊皆擅书画，夫人龚韵珊为广东、湖南

布政使龚嵩人第三女，是沈迈士母亲。五子沈瑞麟，国学生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任比利时公使馆随员，光绪三十四年，以二等参赞官代理驻德公使。宣统元年，调外务部任参事。北洋政府时任外交次长、代理外交总长。

沈秉成喜爱收藏，家中藏品非常丰富，苏州耦园的蝶砚庐即是他的藏书楼，《蝶砚楼诗钞》也是借用了藏书楼的名字。他曾经在京城得到一块石端砚，后一剖为二做成了两块砚台，他们夫妻二人各用一块。后来生了两个儿子，也分别字砚传（沈瑞琳）、砚裔（沈瑞麟），可见他对此砚石的喜爱。唐代三大草圣之一高闲《草书千字文》，曾经被沈秉成收藏，上有“耦园至宝”铃印。明代唐寅《松荫高士图》立轴也曾经为沈秉成收藏，画中钤有“蝶砚庐”鉴藏印。陆心源在《吴兴金石记》中也记录沈秉成收藏的金石非常丰富，有父癸癸、格仲尊、且辛觶、汉虎符等。

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，是晚清大臣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状元，曾任江苏巡抚、闽浙总督、兵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。张之万在江苏居住多年，他跟沈秉成、严永华夫妇很熟悉，他绘的画作曾请严永华题诗，沈秉成刊刻《蝶砚庐诗钞》，即请张之万作序。张之万在序中称赞严永华说：“同治岁辛未，余以苏抚乞养，中丞亦自苏松太道谢秩养病，因约同寓吴门之拙政园，水木明瑟，文讌过从，发藻连情，殆无虚日。余绘拙政园图，夫人题诗其上，复为余绘山水一册，深得元季四大家遗法，至是始悉夫人才艺之工与德并著，心折久之。”又据严永华兄长严辰言，妹妹严永华曾经割股为父治伤，父亲离世后，她又照顾母亲多年，是一个孝女。

鲁迅眼里为什么含着泪

□张达明

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，结识了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运动者宫崎龙介。1931年6月，宫崎龙介携妻子、日本著名女诗人柳原白莲访问上海，夫妇二人順便拜会鲁迅。

为尽地主之谊，鲁迅特设家宴款待宫崎龙介夫妇俩，并邀好友郁达夫作陪。席间，相谈甚欢，话题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国现状。

也许是多喝了几杯，鲁迅慷慨激昂地对中国的许多弊端进行了抨击。柳原白莲见状，问道：“从先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，您十分讨厌出生在

中国，是这样吗？”

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尽管如此，我依然认为，比起任何国家来，还是生在中国好！”

“那您为什么要用那样激烈的言辞抨击中国呢？”宫崎龙介接着问道。

鲁迅回答说：“虽然中国有很多弊端，但她是我的祖国，我真心希望中国这头雄狮能够早一天醒来。”说这话时，鲁迅眼里已经饱含着泪水。见状，郁达夫率先鼓掌，在场的人也都跟着一起喝彩。郁达夫这时站起来说道：“鲁迅眼里含着泪水，因为他对自己的祖国爱得深沉。”

李叔同的“忘年交”

□姚秦川

李叔同一生爱好广泛，喜欢交友。在对待朋友时，李叔同真诚、坦率、善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李叔同的众多朋友中，他曾两次谈到一位朋友对他的批评，由此可见这位朋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。

李叔同第一次提到这位朋友，是在为佛教养正院学僧讲课时。那天，李叔同在讲课后，专门提起了这位朋友，他说：“最近有一位朋友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朋友说我‘以前如闲云野鹤，独来独往，随意栖止’。然而近来竟大改常度，到处演讲，常常见客，时时宴会，简直变成了一个‘应酬的和尚’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李叔同坦诚地对大家说：“这位朋友的来信让我羞愧难当，因为他说的全是事实，我也必须要认真改正。”

李叔同第二次提到这位朋友，是在佛教养正

萧乾的两辈子

□李健

刚读到标题时肯定会疑惑不解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两辈子呢？八成是笔者在故弄玄虚，哗众取宠。实在冤啊，著名作家萧乾的文章就《我这两辈子》，说的是自己在“文革”之初的遭遇。85岁的萧乾回忆道：“倒退二十九个年头儿——您就甭算啦，反正就是到了咽气的那会儿，我也忘不了的那六年。我连日子也没忘，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。那时候北京城（大概全中国吧）可天昏地暗啦，太阳没影啦，世界变成冰窖儿啦！平常的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——因为要是不，别人就朝你龇。满市街抡起大刀，甩着屎棒。向来最惜命的我，最后也顶不住啦，把偷偷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。得！那么一来，我就没气啦，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。反正我还有口气儿，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

可贵的自我克制精神

□唐宝民

郑安娜是著名翻译家冯亦代的妻子，她本人也是一位翻译家，曾和冯亦代共同翻译了一些外国作品。在冯亦代的心目中，郑安娜不但是一位才女，还是一位拥有克制精神的可敬女人。

当年，冯亦代和郑安娜婚后不久，郑安娜就怀孕了。冯亦代便送郑安娜回上海。据冯亦代回忆：“我们搭的是一艘英商太古轮，船航行在海上显得轻飘飘，颠簸得厉害，我素来是不晕船的，这次却不能幸免。可是安娜感觉特别好，吃得下，睡得熟，我开始认为她可能要吃不消的想法有点可笑。事后我问她怎么风浪对她一点没有影响，她笑着说：‘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，不过我克制住了。’。”

关于郑安娜的克制精神，冯亦代还记述了一件事：“有一次几个朋友临时到我家来晚餐，外屋

里一片喧嚣，阵阵酒气和团团烟雾连我都受不住啦。这时突然发现安娜不见了，等到大家吃饱了，便个个散去。最后我听见有叩门的声音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安娜。她在附近散步，因为酒臭、烟熏和烤人的热气，令人不耐的喧哗，使她受不了了，只能下楼去散步。我问她为什么不阻止大家呢？因为安娜怀孕是朋辈都知道的，她笑笑说何必因她而使大家扫兴。”

学会克制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学会克制情绪是一个人情商成熟的表现，也是在为人处世中必须培养的一种品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。郑安娜能保持一种自我克制精神，不让别人感到不安，时刻为他人着想，是十分可敬的。诚如冯亦代所评价的那样：“安娜的自我克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，这便是安娜令人钦佩的地方。”

90年前的《民间》杂志

◎文化史谭 □陈荣力

最近案头搁着的一本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的小册子，常常让我忍不住翻动。这本32开、仅110页的小册子，有三个特别：一是木印直排，出版年代为民国二十年八月（1931年8月）；二是内容丰富，有故事、画谜、对联、歌谣、笑话、谜语等六辑；三是编辑者为民间人士陶茂康，发行者为绍兴汤浦吉昌茶栈。

我不知道我手头这本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是否为孤本，也无从查考《民间》其他几集是否还有遗存（据史料记载《民间》共出过23集）。但从上述三个特点考量，这本小册子为近代最早的民间文学杂志之一，或更确切地说为近代民间编印最早的民间文学杂志之一当不为过。民间编印，民间发行，内容又是民间文学，如此“三民”叠加，加上距今又逾整整九十多年了，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无疑便具多重价值指向了。

先说说编辑者陶茂康。

陶茂康（1901~1970），绍兴汤浦（今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）人。1917年就读于上海澄衷中学，1920年毕业后遵照父意回乡经商，担任其父所开吉昌茶栈的负责人。并先后创办三余俱乐部，搜集整理民间文学，筹办舜阳中学，为汤浦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。我们不知道当初陶茂康搜集整理民间文学，特别是编印《民间》的动因是什么？但有两点必不可少，地域条件和经济支撑。要编印这样的杂志，少了这两点很难想象。这就不能不说说汤浦这个地方和吉昌茶栈了。

地处会稽山东麓的汤浦，为绍兴、上虞、嵊州三县交界，山清水秀，历史悠久，人文积淀丰厚，也是浙东平水珠茶的产区。民国期间汤浦一地常年的茶栈有十七八家，最多时达23家。历史悠久，人文积淀丰厚，民间文学的元素和资源自然也活跃丰富；加上汤浦作为一个茶叶集散地，南来北往的商贾、茶客，也带来了本地以外的民间文学素材；而更重要的是交通、邮递的便捷，为一本民间杂志的组稿、编印和发行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资金保障了。

开设于汤浦上街的吉昌茶栈，由陶茂康之父陶子章创办，1920年陶茂康从上海读书返乡后，即接手吉昌茶栈的经营。当时平水珠茶市场旺

盛，陶茂康趁势而为，对提高珠茶质量、拓展外销渠道等作了多方努力，吉昌茶栈一时成为汤浦茶栈的领头羊。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且又生意兴隆的茶栈作支撑，《民间》编印的资金，想来是不成问题的。

当然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最重要的价值主旨，是其刊载的内容了。

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序文上，作者这样写道：“序文，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序文，大都千篇一律的不是说吾国底古学如何深邃，即是说民间文学底兴起入脑际如何渊激，及开掘民间宝藏为近世必修的现象……等等，我觉得今天我不用需要再写这种闲话。

我，小的时候，睡眠在母亲底怀抱里，听母亲讲个故事，歌只民谣，猜则谜语，总觉得醇醇有味似的。现在，是离开母亲底怀抱了！当然，也听不见母亲底故事，民谣，谜语，于是，我开始烦愁了。

……无意中，读到了陶君编辑的民间，我觉得我又酣睡在母亲底怀抱里了。想吧！它里面有母亲讲的一样底故事，歌谣，谜语；尤其是充满着故乡风味的故事，为最引动我底恬静的心波……”

这篇序文的作者为曾创办《萧山县商报》的章达庵，其亲切、朴实、真挚的文字，既可视作对《民间》的读后感，也一定程度体现了陶茂康和作者对民间文学、对办《民间》的主张和追求。给人以美的憧憬、爱的温暖，以童真的趣味、天真和欢喜，这恰恰就是民间文学的一大本真。

综观《民间》的文本，下面几个特点尤为鲜明：

一是内容特别丰富。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共110页，约4万字左右。分故事、画谜、对联、歌谣、笑话、谜语等六辑。其中故事中又分徐文长的故事、王羲之的故事、巧女的故事、呆女婿的故事等。故事辑中都是绍兴民间故事中熟捻的人物，所以基本上体现了绍兴民间故事的主要题材和欣赏诉求。

歌谣以接地气、题材广、形式活泼、短小通俗而深受百姓喜爱，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中所收歌谣，原汁原味地体现了上述特征。如《小大姐娘》：小大姐娘小打扮，花布包里青凉伞；朝奉先生留我吃早饭，啥下饭？湖羊尾巴酱油蘸，韭菜花儿炒鸭蛋，金华火腿薄薄摊，乌背鲫鱼肉圆嵌，青壳螺

蛳鸟屁股，紫菜放汤下饭。

二是涉及地域广泛。绍兴古为“上八府”之一，旧辖山阴、会稽、上虞、诸暨、嵊县、新昌、余姚、萧山八县。虽然嗣后行政管理辖有所调整，但在人文地缘和风土习俗上，这八县的大绍兴概念，始终是一种隐性的存在，于文化的交往同样如此。这一点在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中也明显体现出来。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的作者（搜集者）以绍兴、上虞、嵊县、诸暨、萧山、余姚等地为主。也有海宁、江山、东阳、永康及杭州、上海等地的作者（搜集者）。

在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的“尾声”中，陶茂康这样记了一笔：（在第二集出版后）承蒙绍兴何植三先生惠赠《农家的紫草》诗集一册，杭州姜子匡先生惠赠《民俗周刊》七期，汕头林培庐先生惠赠《民俗》一份，广州朱景桐先生惠赠《广州市政刊》一份，吉林花沛三先生惠赠《吉长中学附小校刊》一份，特此志谢！

书刊的交往，严格来说算不上发行，但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想来远及汕头、广州和吉林的这些先生，也应该是收到过《民间》的。

三是趣味多彩多姿。大凡民间文学，在反映风情风俗、表达爱憎情感、诉说企盼愿景的同时，一个关键的核心词是什么？我个人的理解就是：趣味。这也是民间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个最大特征。

这样的趣味，在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中，首先体现在题材的多种多样上。如故事中除上述提到的徐文长、王羲之、巧女、呆女婿等题材外，还有樟树通灵、葫芦人、医驼背、读白字、猫鼠敌岗、捕鱼得妻等题材的故事。

农谣和谜语是民间文学知识性的典型体现，窃以为也是民间文学趣味的鲜明表征。知识性的渗入、互动和消化，无疑是趣味得以持续、长久以至常读常新的重要支撑，或者说知识性是更高层次、更深意义上的趣味。在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中，除农谣、农歌外，谜语为数量最多的一类，达189则。

需要特别一提的是，综观《民间》（第三集）的所有作品，绝无低劣、恶俗以及“带色”的作品（民间文字中的“荤故事”“荤笑话”也并非个例）。启蒙和教化无疑是隐于民间文学传播与推广背后的两大圭臬，从中我们也可窥探陶茂康作为一个乡村进步知识分子的操守和风气。



1914年的嘉兴火车站

嘉兴火车站始建于1907年，1909年投入使用，是当时沪杭线上重要的交通枢纽。1921年，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，会议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嘉兴火车站是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节点。图为1914年的嘉兴火车站。

照片提供者：江新诗